

# 中文 版序

從1996年開始做最初研究到2016年本書英文版付印，歷時二十年；而從英文版面世到此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又經歷了十年之久。但我不能誇張地說此書耗了我三十載的光陰。事實上，若從時間與精力的投入來看，本書是我自1989年投身女權活動以來的一個「副產品」，雖然它又是我以撰寫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為己任的主要作品之一。<sup>1</sup>幾十年來，女權活動與女權歷史研究交叉進行的歷程也許會是中文版讀者感興趣的話題，故在此費點筆墨補充一些關於本書寫作的背景介紹。

這二十年的田野調查和檔案研究大多是在我1995年完成博士學位後，利用每年回國參與女權主義學術

---

1 作者第一部中國女權主義歷史英文專著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的中文版《五四女性：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於202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他相關中英文書目與文章，請見作者個人網頁：<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活動的縫隙時間搭便車做的。最初的構想是寫我老家上海的一個里弄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變遷歷史。但當我一開始訪問左鄰右舍的老太太們時，卻立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里弄婦女對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後「婦代會」和「居委會」成立和發展過程的記憶，是我原先不具備的歷史知識。上海市婦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的突出作用尤其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因為在里弄婦女的回憶中，那些積極組織動員里弄家庭婦女的年輕婦聯幹部顯然用了不少女權主義詞語。為了佐證在訪談中的發現，我一頭扎進了上海市檔案館。

所幸的是在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歷史學者尚能較少障礙地調閱1949年後市政府一些部門相當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檔案，故收穫頗豐。上海市婦聯從1949到1966年的檔案清晰記載了年輕的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勇敢的批評、質疑聲音和滿腔熱情地為草根婦女爭取權益的行動；市婦聯領導的工作報告和會議記錄更時時透露出，她們如何在體制內部運用策略，以爭取婦女利益、發展婦聯組織並維護其生存空間。這些幕後歷史場景是僅靠訪問基層婦女所無法獲得的，更是學者無法憑空想像的。歷史學者的發現顯然和她的關注點以及知識儲備有關，更離不開相關史料的獲得。

正是依靠對基層婦女的訪談和歷史檔案的對照研究，以及之前對中美女權歷史的了解，使我不被自身所處時空的主導話語裹挾，盡我所能地做一名忠實於歷史過程的誠實的學者。我基於對上海市婦聯的歷史研究寫成的論文於2005年發表在美國學術期刊《女權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sup>2</sup> 質疑了當時流行於國內外學界的「社會主義父權

---

2 論文為“‘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 no. 3 (2005): 519–551，獲得了2006年伯克夏女史學家會(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文獎。回頭看，正因為這篇論文，我開始聚焦「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擱置了城市基層社會在社會主義時期歷史變遷的研究課題，無意中激發了國際學界對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權歷史的研究興趣。在本書英文版發表後，我和有相同興趣的學者於2019年聯手在密西根大學召開了一個全球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歐美多國。關於這個研討會的內容參見：<https://www.globalsocialistfeminism.com/conference>。

制國家解放了中國婦女」的說法，首次用社會性別分析方法透視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並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的概念，引起海外學界關注。此篇論文修改充實後成為了本書的第一章。

更幸運的是：這二十年的研究歷程伴隨著我積極介入中國女權主義行動的過程。那時正值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是進行女權行動的絕佳歷史契機，做中國女權運動歷史的我自然明白機不可失，必須抓住。因此在1995年獲得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我並未選擇在美國任教（密西根大學婦女學項目曾於1994年有意聘我），而是投入了國內的女權運動，成為「世婦會一代」中國女權主義行動者中的一員。

我的行動目標是和國內女權學者一起推動中國高校課程改革，將女權主義學術引入學校教育和學界知識生產，希冀女權主義理論和分析框架成為一股批判力量，以抗衡甚囂塵上的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並轉化成改造男尊女卑社會文化習俗與社會性別等級制度的智性話語，進而培養21世紀的新人。在那二十年裏，我爭取了多個國際基金會的贊助，用於在國內辦高校師資培訓、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組織翻譯出版女權學術著作，以及幫助國內青年學者到密西根大學訪學等。

為了爭取美國亨利·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大筆贊助（其先決條件是我必須有個美國機構接受和管理項目經費），我決定接受密西根大學的教職。直接原因是，早在1994年就希望我加盟密大婦女學項目的主任阿比蓋爾·斯圖爾特（Abigail Stewart）教授，此時已是新創立的密大社會性別研究所的所長。她主動提出我只需一半時間在婦女學任教，另一半時間可繼續我在中國的女權活動；新創立的研究所將聘我為研究員，並負責接受和管理我將獲得的路斯基金會項目經費（研究所有專職的財務人員管理研究員的課題經費，並有文祕協助項目活動相關事務）。談完這些出乎我意料的周到安排後，她加了一句：「我知道，你要是不能繼續做中國的女權活動，你就不會來。」一位與我交往並不深的美國女權學者竟然能如此理解我，並暖心地做出具體安排支持我的追求，著實令我感動。此後她也始終對

我組織的各項女權活動大力支持。而我在她構想中的角色，就是通過開設中國婦女史和全球女權運動史課程（她也努力招聘做其他國別婦女研究的學者）以改革密大婦女學，並讓密大婦女學師生有機會參與我組織的中國女權活動，力圖使美國婦女學師生有全球視野，改變婦女學尚存在的美國中心傾向。<sup>3</sup>就這樣，從2002年初開始，我每年一半時間在密大教課，一半時間在中國舉辦師資培訓或組織其他女權學術活動。這些活動的參與者有不少是體制內的女權主義者，包括婦聯幹部。當然，我也利用在國內的時間見縫插針地繼續做訪談和檔案研究。

這二十年裏我有條件平行地做兩件我看作使命的事，實屬好運。我把主要精力和時間投入中國當代女權主義行動，同時斷斷續續地做1949年以後的國家女權主義歷史研究，不久就體會到兩者互補的好處，儘管前者是本書英文原作花了二十年才完成的主要原因。投入世婦會籌備和組織工作的那屆婦聯有不少幹部與我研究的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非常相似，她們都有推動婦女解放事業發展的激情和動性。雖然有體制的束縛，但受惠於當時中國在1989年之後急於重返國際社會、招商引資繼續「經濟改革」的大氣候，婦聯在「與國際接軌」的中央政策下可以名正言順地提出「與國際婦女運動接軌」的口號，<sup>4</sup>許

---

3 斯圖爾特教授在我接受密大教職那一年開始了「全球女權主義訪談項目」(Global Feminisms Project; <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我也是這個課題組的成員，負責對中國女權主義行動者的訪談。這項課題自2002年開始，最初只涵蓋四個國家共四十位女權主義者的訪談，如今已擴大到十多個國家共一百多份口述紀錄，是可用於全球多地女權主義運動發展比較研究的豐富資料庫。這項如今依然持續發展的課題也是斯圖爾特教授不懈拓展美國女權主義教學和研究視野的一項工作。

4 而到了2017年，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宋秀岩在對全國省市婦聯主席培訓班的報告中卻稱「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他們抨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和我國實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積極兜售西方的『女權主義』、『女權至上』，有的打著所謂的『維權』、『扶貧』、『慈善』等旗號，直接插手我國婦女事務，企圖在婦女領域尋找和打開缺口」。二十多年前「與國際接軌」的政治氛圍已經不復存在。見<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613/c227126-29336313.html>，2025年12月11日訪問。

多婦聯幹部表現出開放的心態，積極參與各項國際交流活動，以平和及好奇的態度傾聽和觀察來自國門外的各種思潮觀點，隨時準備採納對中國婦女事業有用的理論概念和分析方法及具體實踐措施。她們以熱情友好的態度接納了我這個以海外中華婦女學學會<sup>5</sup>成員身分參加各項活動的留美學生，我和其中多位建立了持久的友誼，日後的調查研究和尋訪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時得到她們至關重要的大量幫助，可以說沒有與她們的友誼就沒有這本書。

世婦會這一代的國家女權主義者與隨著籌備非政府組織(NGO)論壇產生的諸多民間女權組織有良好的互動與合作關係，除了當時黨中央允許的較為開放的政治氛圍外，也因為這兩撥人中很多都是具有「老三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經歷、高考恢復後的首屆大學畢業生，有共同的時代背景。許多創立民間婦女組織(或稱婦女NGO)的帶頭人也都在國家體制內工作，如高校、社會科學院、甚至婦聯系統。當時私營企業尚少，除了一些像我這樣出國留學的，77級大學畢業生基本都分配在體制內就業，到1995年世婦會時一些人已在體制內達到中層幹部級別，屬於有些體制內資源的知識群體。她們共同的經歷不僅包

---

5 海外中華婦女學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Women's Studies, CSWS)由六位留美女博士於1989年成立，本人為初創成員。在世婦會前後，CSWS成員做了許多譯介女權主義學術的工作，與國內體制內外女權主義者有諸多合作，是中國留學生在國內傳播女權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當時學會集體譯介的作品包括：鮑曉蘭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譚競嫦、信春鷹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彙釋義》(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王政、杜芳琴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馬元曦等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學會部分成員在1993年參加由天津師範大學組織的為時兩週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會，介紹國外女權主義，是當時國內婦女研究界首次較大範圍地接觸到國外女權主義理論和行動信息。研討會的發言紀錄與當時的報導收入杜芳琴編、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編譯，《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也正是在這次研討會上，我強烈地感受到國內婦女研究界的開放心態和對國外女權主義理論知識的渴求，從而開始了有意識地集中力量譯介社會性別理論的工作，來滿足國內體制內外女權主義行動者的需求。

括上山下鄉、文革後高考、畢業後分配在體制內就業，更包括同樣的社會性別觀念，即，她們既是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在社會主義中國推動的男女平等話語與實踐的受惠者，更是被社會主義時期男女平等主流話語形塑了主體身分的女權主義行動者。因此，在與世婦會這一代婦聯幹部和婦女NGO創建者的交往中，我不僅毫無隔膜感，並且基於我的歷史研究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代女權行動者對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在觀念形態和策略上的繼承。在一些婦聯幹部組織或參與的會議上我常常會悄然一笑，因為眼前的國家女權主義者採取的策略，令我想起在歷史檔案中和回憶錄中看到的相似歷史場景。同樣，在埋頭閱讀檔案時，文字中展現的充滿激情的1950至60年代年輕婦女幹部也會使我聯想起身邊具體的體制內女權主義行動者的風貌。世婦會一代女權主義者不僅傳承了前輩國家女權主義者婦女解放的激情，中國政治體制的延續也決定了世紀末的國家女權主義者與毛澤東時代的前輩有相同的體制內行為邏輯，即使她們並不了解前輩的策略。正是因為平行穿梭於歷史檔案的研究與當下女權實踐的不同時空中，我對國家女權主義者在體制內運作的「自我隱身的政治策略」及「話語嵌入式方法」才有了較深入的理解和較清晰表述的可能。

當然，憑藉「與國際婦女運動接軌」的歷史機遇，世婦會一代中國女權主義者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必然有屬於她們的突破與創新，而非墨守成規的繼承者。這代女權主義者與形形色色的全球女權主義者的頻繁深入交往是史無前例的，在五彩繽紛的全球女權主義思潮和議題激盪中創造出扎根中國基層社會的實踐，是中國女權主義歷史中的華麗篇章，尤其是她們運用引進的女權主義核心概念——社會性別（gender）——所創造的多種「社會性別培訓」形式，在許多地區和領域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改變。<sup>6</sup>因為世婦會一代女權主義者的歷程不是本

---

6 參見本人對包括世婦會一代女權主義者在內的三代女權主義者的英文研究論文：“Feminist Struggles in a Changing China,” in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d. Ping Zhu and Hui Faye Xiao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7–156。

書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略地強調她們與社會主義時期國家女權主義者的傳承關係。其中最突出的傳承有幾點：一、即使是創立非政府組織的女權主義者也深諳體制內運作的規則，是因為她們本身就在體制內；二、她們熟悉一套自幼即耳熟能詳的官方政治語言，懂得如何策略地調遣這套語言為實現婦女利益服務；三、她們有體制內的人脈資源並能調遣這些資源進行有效博弈來推出符合婦女利益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的問世即為體制內外女權主義者合力成功的一例，儘管經歷了二十年的艱辛鬥爭；<sup>7</sup>四、雖然世婦會一代的特殊歷史機遇使她們具有前輩所沒有的全球女權主義理論背景，但她們身處體制內的現實也使她們和前輩一樣受到同樣政體的束縛，也會按體制內的邏輯發展出與體制打交道的策略。

但這類傳承也許會因為世婦會一代女權主義者告別歷史舞台而削弱，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年輕人難以獲得前輩投身女權主義行動的知識（如今連世婦會一代女權主義行動也鮮有年輕人知曉），還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出生成長的眾多青年女權主義者從無在體制內就業的經驗。更確切地說，在中國經濟模式和社會文化急遽變化的幾十年裏，年輕人與父母輩的代溝也隨之擴大，具體如在好萊塢影視劇、韓劇、日本動漫、網絡遊戲浸潤中成長的年輕人與每日必看《新聞聯播》的前輩之間的文化溝壑（當然還有眾多整日奔波於維持生計而兩者都無暇顧及的底層勞動者）。雖然都說著漢語，但兩代人用的顯然不是同樣的言詞用語，折射出不同話語建構的不同主體身分。這種深刻的代溝/文化溝壑可以被看作是有著積極意義的現象（認知的飛越往往產生於不同話語的碰撞衝突之際）。不過，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體制並無根本變化，掌權的各級官員在用體制外年輕人所不懂的語言和行為邏輯做決策。

---

7 1995年舉辦世婦會時中國政府還不承認中國存在家庭暴力，家醜不可外揚。一些地方婦聯只能悄悄地創辦被家暴婦女避難所，不得張揚，以免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世婦會後中國民間婦女反家暴組織的成立對推動家暴議題進入公共話語場域以及和國家女權主義者聯手推進立法起了關鍵作用。

這種隔膜對一般不需與官方直接打交道的人群似乎無關緊要，雖然政府決策必然涉及普通民眾的福祉。但對欲從事社會改造的任何群體包括年輕的女權主義者而言，對自己身處的政體和官方邏輯了解甚少則必然會影響各種社會文化或政治經濟改造行動的效應。如何能既保持對官僚體制文化的警覺，又不因政治疏離感而失去了解政治體制的興趣？如何填補學校教育在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歷史知識方面的空白？如何獲得對自身所處時空局限性的洞察力以及突破限制的創造力？如何在缺乏傳承機制的社會中思考和實踐女權主義歷史傳承問題？這些可能是女權主義者以及所有社會改造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很高興關注中國女權主義的你，翻開了這部歷史作品。我相信，女權前輩在動盪險峻的政治環境中堅忍不拔地在體制內推進對男權社會文化的改造和爭取婦女權益的經驗、策略、局限，會為讀者帶來珍貴的洞見和啟迪。以史為鑒，我們將能辨析自第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離世以來，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思考我們在這獨特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人生追求。作為一名女權主義歷史學者，我堅信前輩女權鬥爭的經歷會激勵後人以堅定智慧的行動來延續中國女權主義歷史。

2025年12月18日

# 鳴謝

本書的起點，是二十年前我對上海某里弄的初步研究。在這些年裏，承蒙許多人的支持與幫助，這項研究才得以不斷拓展，成就了今日的成果。

我首先要向所有接受訪談的中國受訪者，致以最深摯的謝意。她/他們不僅為我引薦更多訪談對象，更慷慨分享珍貴的史料。本書每一位受訪者，都以來自不同社會背景與地域的多元故事，照亮了那段幽暗而複雜的歷史進程。那些字跡泛黃、厚重沉甸的檔案，唯有與受訪者鮮活的生命經歷相互印證，才能真正透露出深層的意義。1949年後中國的檔案開放政策時有限制且多變，這項深入歷史幕後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實現，全仰仗新朋舊友的無私相助。在此特別感謝惠贈私人收藏資料，以及協助搜集口述、文字與影像史料的各位朋友：曾立、曾自、尚少華、陳方、陶春芳、侯荻、陳文靜、盧正珉、劉軍、魯明、楊慧、姜麗芬、蘇平、章黎明、羅蘇文、王慶淑、黃甘英、趙焯、廖心文、陳向東、陳向軍、馮曼東、黃準、王永芳、馮奇、李歇浦、孟犁

野、陳雁、余寧平。若無她/他們的慷慨相助，我就無法以具體的實證構建起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的歷史敘事。同時，我也要衷心感謝弗朗西斯卡·德·漢 (Francisca de Haan) 非常慷慨地跟我分享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的重要檔案，更指出中國女權主義者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最初，我僅將與國家女權主義主題有關的文章，視為里弄研究的自然延伸。直到賀蕭 (Gail Hershatter) 首先建議我應以此為題，撰寫一本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女權主義的專著，本書的構想才由此萌芽。在書稿完成階段，高彥頤 (Dorothy Ko) 為全書架構提供了寶貴建議。她與加州大學出版社三位匿名審稿人的深刻見解，對最終書稿的重組與定稿至關重要。格雷·奧斯特魯德 (Grey Osterud) 逐章審閱，提出細緻意見，令我能更清晰地向不熟悉中國歷史的英語讀者闡釋複雜議題。克萊爾·摩西 (Claire Moses) 更以卓越的編輯眼光逐頁審讀全稿，提出許多精彩建議，令歷史敘事更加連貫，論證也更為嚴密。若沒有她在最後修訂階段的敏銳洞察，本書絕難以現今的面貌問世。

在本書漫長的寫作歲月裏，承蒙許多師友通讀全稿或細究部分章節，並給予懇切建言。我要特別感謝以下諸位：賀蕭、高彥頤、西多妮·史密斯 (Sidonie Smith)、米瑞尼·辛哈 (Mrinalini Sinha)、阿比蓋爾·斯圖爾特·韓起瀾 (Emily Honig)、伊麗莎白·克羅爾 (Elisabeth Croll)、克里斯蒂娜·K·吉爾馬丁 (Christina K. Gilmartin)、艾華 (Harriet Evans)、茱莉亞·施特勞斯 (Julia Strauss)、伊麗莎白·雷米克 (Elizabeth Remick)、黛博拉·戴維斯 (Deborah Davis)、吳一慶、唐小兵、戴維·古德曼 (David Goodman)、梁莊愛倫 (Ellen Johnston Laing)、瓊·卡登 (Joan Cadden)、尼基·曼德爾 (Nikki Mandell)、卡羅爾·博伊德 (Carol Boyd)、黛博拉·凱勒-科恩 (Deborah Keller-Cohen)、蘇珊·西格弗里德 (Susan Siegfried)、安娜·柯克蘭 (Anna Kirkland)、伊麗莎白·科爾 (Elizabeth Cole)、宋少鵬、李南央。她/他們的批評與提問不斷砥礪我的思考，幫助我打磨論證的鋒芒，也

讓我得以融匯來自不同地域的研究成果。若沒有她/他們的支持與鼓勵，這部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的歷史敘事，將無從誕生。

承蒙多所院校及學術會議同仁的厚愛，讓我得以展示階段性研究成果。以下學術機構的活動反饋令我獲益良多：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布朗大學彭布羅克中心 (Pembroke Center, Brown University)、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艾格尼絲·斯科特學院 (Agnes Scott College)、埃默里大學 (Emory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韓國崇實大學中國女性研究委員會 (Chinese Women's Research Committee, Soongsil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高等研究院、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廣西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與華東師範大學。

本書第三章與第五章的早期版本曾在中文期刊及文集發表過。朱劍對我早期研究中有關《中國婦女》的圖像提出深刻見解；劉慧英對陳波兒的提問，也促使我深入追溯這位女權主義藝術家的生命軌跡；呂新雨、唐小兵、蘇狀與王向賢亦對中文初稿提出過寶貴意見，使我在修訂英文版時思路更趨清晰，並更兼顧未來中文讀者的閱讀期待。

密西根大學與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如今已進入高校教職和其他專業領域——為我的研究和技術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特別感謝復旦大學陳雁教授推薦優秀的研究生擔任研究助理。候豔興在檔案與網絡檢索中展現出史學專業素養；唐春暉精心製作了《中國婦女》每期封面的電子副本；賈欽涵在我返美授課期間協助複印抄錄關鍵檔案；劉怡協助查證資料並取得部分影像授權；高敬文則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在漫長的寫作歲月中，密西根大學的

莎拉·M·布魯克斯 (Sarah M. Brooks)、李旭、埃里克·庫爾勒 (Eric Couillard)、李伊頤、郝宇聰、約書亞·哈伯德 (Joshua Hubbard)、郭一驊、趙宓以各種方式給予我幫助。我也特別感謝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楊繼東 (後赴斯坦福大學任職) 與傅良瑜，每當我急需查證文獻時，總能得到她/他們迅速回覆和鼎力相助。若無她/他們的支持，我難以拓展本研究的深度。

此外，衷心感謝東北師範大學王晶教授推薦學生董雪姣協助搜集長春電影製片廠的相關資料；胡曉紅教授邀請我前往長春，並陪同參觀建於舊址的長影舊址博物館。在那裏，我目睹陳波兒全身雕像矗立於長影創始人群像中央，內心激動難抑。

尤其感謝藝術家劉虹為我設計英文版封面，展現了她對內容的深刻理解與熱情支持。她非凡的創造力與慷慨相助，不僅為本書增色，更圓滿了我的心願。早在了解到陳波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女英雄影片《中華女兒》的重要貢獻之前，我已深深被劉虹對該片中女英烈群像的大型系列油畫藝術再現所打動。圍繞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歷史的視覺再現，我們之間的討論激蕩出女權主義精神的共鳴，也為深陷長期寫作的我注入了新的能量。

本研究在中國的初期田野工作，承蒙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研究獎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Research Award) 的支持。斯坦福大學人文中心研究員基金 (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 Fellowship) 資助我整理口述史料與檔案，並完成首章初稿。多年來，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多次資助我回國進行田野研究；校內多項資助——包括教師發展基金、文理學院研究基金及密西根人文獎——支撐了研究範圍的拓展與後續訪談的進行。文理學院副教授支持基金、人文研究所駐校研究員基金與密西根大學教師暑期寫作資助計劃，也使我能專注寫作並得到專業編校協助完成此書。衷心感謝為我撰寫基金推薦信的諸位師友：曼素恩 (Susan Mann)、賀聶、高彥頤、瑪麗蓮·楊 (Marilyn Young)、阿比蓋爾·斯圖爾特、高明 (Mary Gallagher) 與西多妮·史密斯。

我也由衷感謝在過去二十年間，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路斯基金會與樂施會 (Oxfam) 為我在中國組織女權主義學術活動提供了多項資助。它們使我能立足於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不僅是作為書寫中國婦女史的學者，也是作為跨國連結多元中國女權社群的行動者，與同仁一起參與歷史變革。我在中國的活動項目大大豐富了我的學術研究：不但為研究拓展了關鍵的人際網絡，深化了我對女權主義者幕後策略的理解，也讓我更敏銳地捕捉到中國女權運動與社會政治脈動的變化。

身為研究中國女權主義運動史的學者，我深知這些基金會資源對維持當代中國女權鬥爭的重要意義。在此，謹向那些在幕後支持並推動女權倡議的同道者致敬。

在二十年的檔案研究與田野調查中，我在中國的大家庭始終給予我堅定的支持。項目初期，當我的孩子尚在學齡前，秀之與秀君兩位姐姐以及姐夫卓宗華與張元昌，常代為照料孩子並準備美味的飯菜。小哥曉猷與小嫂龔蓮芳常贈禮物並陪伴孩子玩耍。二哥晰猷與二嫂李聖英則在我到西安調查時熱情接待並照料孩子。孩子們隨我每年回國暫居的那些歲月，因親戚們寵愛有加的陪伴而擁有無數歡樂的珍貴記憶，未因母親無法經常陪伴而缺失親情關愛，也使我得以心無旁騖地投入研究與行動。

孩子們的父親 John Palmer 在孩子幼時承擔了主要的照料責任，使我能夠專注撰寫前兩章初稿。感謝一雙兒女夏憶與力亞為我的人生帶來無限喜悅。如今兒女已成年，仍常與我討論國內外女權主義等諸多議題，始終是我最大的欣慰。

謹以此書獻給我摯愛的雙親李廣惠、王宇生——深深地遺憾在我成為歷史學者之前，雙親已與世長辭。

本書部分章節的初稿曾發表於以下刊物：〈「國家女權主義？」——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性別與社會主義國家建構〉（“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刊於

《女權主義研究》，第31卷，第3期（2005），頁519–551；〈內部動員者的困境：1957年的中國國家女權主義者〉（“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刊於《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第188期（2006），頁913–932；〈創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文化陣地：《中國婦女》（1949–1966）〉，英文原版（“Creating a Socialist Feminist Cultural Front: *Women of China* (1949–1966)”）刊於《中國季刊》，第204期（2010），頁827–849，中文版刊於《南京大學學報》，第47卷，第6期（2010），頁58–75。本書第五章的初稿為中文論文〈女權尋蹤：陳波兒與中國社會主義電影範式的創立〉，發表於2011年12月由密西根大學與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華人性別與視覺再現」國際研討會上，後收入論文集《性別與視覺：百年中國影像研究》（王政、呂新雨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113–160。

2016年於安娜堡

## 中文版補充鳴謝

2016年我向加州大學出版社遞交英文書稿時，並未期待很快能出中文版，因為我非常了解在國內急遽變化的政治氛圍之下，有關中國女權主義的話題已經被視為禁區。所以我首先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這部中國女權主義歷史著作的大力支持，同時感謝出版社編輯們對這部中文版的傾心投入，尤其感謝林驍為了保證譯本質量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改善人工智能翻譯，以及謝秉強先生在整個過程中提供的技術支持。

因為在國內授課的需要，2017年我曾用個人課題經費支付了一群青年學者的翻譯費，將英文原作譯成中文在我的課上作為教材使用。除了序言外，我沒有授權公開傳播中譯電子版。雖然此次中文版為了保持譯文風格一致而進行了整體重譯，我依然要感謝當年耗時費力、分工翻譯本書各章的十幾位青年學者，使得本書在國內青年女權圈子

裏有一定的影響。此次中文版的參考文獻部分保留了鄭熹的細心翻譯，特此表示感謝。

我也特別感激在中文版最後校對過程中，胡曉紅、周韻和劉君代為中文版添加的插圖提供技術支持，以及武承睿迅速為我查核書名與作者。海內外年輕人對中文版的大力支持使我堅信：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知識必能得到傳承。為此，我也感謝將成為中文版讀者的你。

2025年12月21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